



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 编

中国西南夜郎文化研究文集

卷二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 编

中国西南夜郎文化研究文集

(卷二)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光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南夜郎文化研究文集. 卷2/刘胜康,熊宗仁,王子尧主编.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412-1419-6

I. 中… II. ①刘…②熊…③王… III. 夜郎—民族文化—西南地区—文集 IV. K2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8120 号

中国西南夜郎文化研究文集(卷二)

刘胜康 熊宗仁 王子尧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阳云岩通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 230mm 1/32 印张:13.25 字数:331 千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 100 册

ISBN 978-7-5412-1419-6/K · 138 定价:38.80 元



序 言

刘胜康

《中国西南夜郎文化研究文集》卷二即将出版发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值得庆贺。今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一年,是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建院两周年,也是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取得丰硕成果的两周年。夜郎文化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中国西南夜郎文化研究文集》卷一的出版和卷二的即将问世。

在贵州民族学院成立夜郎文化的专门研究机构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并在省内的一些县设立分院,这在贵州学术研究史上是一个创举,它开创了夜郎文化研究的新阶段,是夜郎文化研究更加深入,进一步取得丰硕成果的组织保障。是贵州民族学院与地方政府合作攻关,联合办科研的一种重要形式。在研究院的精心策划与周密组织安排下,采取专家研究与群众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这诸多研究的好方法,值得提倡和发扬。

在研究过程中,需注意处理的“夜郎国”与“夜郎县”的时空关系,“夜郎文化”与现代文化建设的关系,“品牌”与“效应”的关系,“历史”与“戏说”的关系,“学术研究”与“商业炒作”的关系,使夜郎文化研究更加璀璨夺目,使夜郎文化研究更加具有权威性,使夜郎文化研究更上一层楼。

夜郎文化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因此,研究夜郎文化,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去进行研究。

我们说研究夜郎或夜郎国,是指西汉河平年间前的夜郎或夜郎国,



这就是静态的夜郎和夜郎国。因此,西汉河平年间前的夜郎文化或夜郎国文化,是静态的凝固的文化,或者叫做“死文化”,西汉河平年间以后,以夜郎命名的县,是动态的“夜郎”,如唐宋时期贵州桐梓、道真、石阡的“夜郎县”,湖南湘西麻阳的侗族“夜郎县”。当然,这些“夜郎县”后来也成了凝固的静态的夜郎县。夜郎县如同夜郎国一样,也有静态的凝固的或死的夜郎县文化。由于像桐梓、道真、石阡等地,属于夜郎国故地,因此夜郎县“死文化”中,有的可能就是夜郎国的静态文化的组成部分。夜郎国当时在西南可以说是一个“大国”,地域广,不仅建过夜郎县的地方是它的故地,就是很多地方如长顺、六枝和赫章等地都是它的故地,都可能有静态的凝固的“死文化”。这种静态的凝固的“死文化”,主要从两个方面得知。这就是一是考古资料,二是文献,特别是民族文献资料。因此,我们在研究夜郎文化的时候,无论是研究夜郎国的或是研究夜郎县的静态的凝固的“死文化”,都要有可靠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为依据。只有占有可靠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夜郎文化研究才能达到具有科学性、学术性和权威性。所以,无论是研究夜郎国静态文化或是研究夜郎县静态文化,都必须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上下工夫,狠抓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不放松。克服在目前夜郎静态文化研究中,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不足不实现象。

所谓动态的活的文化,就是传承的,或在传承的过程中,发展了的及异变了的文化。我们说研究夜郎的动态的活的文化,就是研究夜郎国或夜郎县故地上的动态的活的文化。在研究的方法上,也必须用动态的方法去研究,避免将夜郎国或夜郎县静态的凝固的“死文化”,与夜郎国或夜郎县故地上的动态的活的传承的,在传承过程中发展了的及异变了的文化混淆。夜郎国或夜郎县动态的活的文化,主要从它的故地上的现代民族文化的技术体系、价值体系和介质体系中表现出来。因此,我们研究夜郎国或夜郎县故地上的动态的活文化,传承的或在传承中发展了的或异变了的文化,必须用对比的方法进行研究。将夜郎国或夜郎县的静态的凝固的“死文化”的技术体系,价值体系和介质体系,与夜郎国或夜郎县故地上的现代民族文化的技术体系,价值体系和介质体系,进行系统的,有机的对比研究,得出夜郎国或夜郎县文



化的流,找出现代民族文化的源,源流结合地进行研究。具体地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

第一,从语言文字方面进行对比研究。语言是民族形成最具特征的重要要素和标志。我们可以把夜郎民族的语言和现代民族的语言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夜郎民族语言的流和现代民族语言的源,研究出夜郎民族的语言是如何发展,演变成现代民族语言。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是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有文字的现代民族,他们的文字与夜郎有何关系?记录的语言与夜郎民族语言有何关系?没有文字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语言,与夜郎民族语言有何关系?

第二,从民族民间口头文学进行对比研究。民族民间口头文学,是民族民间用自己的母语创作,口耳相授,世代相传的文学,内容非常丰富,反映了现代各民族社会生活,历史与信仰,情感与审美,艺术与情趣。民族民间口头文学进行对比研究,是夜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与夜郎民族音乐的对比研究。民族民间的传统音乐,具有深远的历史发展脉络,是各族政治、经济、生产、生活、民情风俗和原始宗教的深刻反映,体现了各族的审美观念。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与夜郎民族音乐的对比研究,是夜郎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四,民族民间舞蹈,与夜郎舞蹈对比研究。不仅对舞蹈形式进行对比研究,而且要对性质、功能进行对比研究。

第五,民族民间戏剧,与夜郎民族戏剧的对比研究。现代民族民间有一些典型的传统戏剧,可与夜郎民族的戏剧作对比研究。

第六,民族民间绘画艺术,与夜郎民族绘画艺术的对比研究。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丰富,可与夜郎民族绘画艺术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

第七,民族民间传统工艺和服饰,与夜郎民族的工艺和服饰进行对比研究。民族民间传统工艺和服饰,是民族民间重要的物化文化,体现了民族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和审美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深层的文化内涵层次。如蜡染与扎染结合的工艺,漆器工艺,编织工艺,挑刺绣花工艺,陶瓷工艺,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服饰,进行对比研究。



第八,民族民间传统体育,与夜郎民族体育的对比研究。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源远流长,可进行对比的研究,找出它与夜郎民族体育的渊源关系。

第九,民族民间传统婚丧祭祀及其礼仪,与夜郎民族婚丧祭祀及其礼仪的对比研究。夜郎故土上的现代民族民间传统婚丧祭祀及其礼仪,历史渊源久远,文化内容非常丰富,形式独特,种类繁多,仪式冗杂。与夜郎的民族婚丧祭祀及其礼仪进行对比研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第十,民族民间传统饮食,与夜郎民族饮食的对比研究。可从主食、副食和饮料等方面作对比研究。

第十一,民族民间建筑和三雕艺术,与夜郎民族建筑和三雕艺术对比研究。夜郎故土上的现代民族建筑,宗祠寺庙建筑,石头城镇建筑,民居建筑以及墓葬建筑,纪念碑建筑。三雕艺术主要有木、砖、石材加工与花纹图案艺术。

第十二,民族民间传统节日,与夜郎民族节日对比研究。

对以上十二个方面的对比研究必须吃透什么是夜郎文化,夜郎静态文化,什么是现代民族的传统文化,什么是夜郎文化的特征,什么是现代民族文化的特征。只有两头都吃透了,才能进行对比,找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源流,也就找到了夜郎文化与现代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

实施好“十一五”规划,研究好夜郎文化,以便更好地打出夜郎品牌,服务现实,光大西南,饮誉海内外,这是夜郎文化研究同仁的共同心愿,共同使命。

2006年11月13日



目 录

序 言	刘胜康(1)
夜郎青铜立虎与崇虎信仰试析	余宏模(1)
夜郎文化的公共符号	王鸿儒(14)
夜郎巫文化与贵州佛教文化研究(上)	王路平(28)
夜郎文化——农耕文明的璀璨明珠	李生福 李闻文(51)
夜郎竹王、竹图腾与芦笙文化本质特征研究	王德坝(58)
试述夜郎的势力范围及其中心地区	翁家烈(71)
郎岱——夜郎宗长国都邑的简称	蒋南华(76)
夜郎故都——可乐	龙宪良(82)
夜郎古国的形成与建都可乐	陈绍举(98)
浅谈夜郎故地——广顺	寇金富(112)
试探夜郎疆域	李洪涛(122)
夜郎考古最新进展	
——2004年威宁中水考古发现综论	张合荣(130)
夜郎核心区考古发掘时不我待	刘瑜安 刘玉伦(141)
关于建立泛珠三角夜郎文化旅游圈的构想	熊宗仁(146)
论夜郎历史文化及其保护的国际化合作思路	王子尧(156)
夜郎文化旅游资源的定位定量分析	安文新(177)
夜郎故地自然生态与人类的和谐文明文化研究	鲁 云(184)
贵州屋脊夜郎石林开发的构想	陈世鹏(192)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推动新晃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 王行水(199)

从更大范围更高起点深入持久地打造夜郎文化旅游品牌

..... 张家茂(205)

第一个五年 唱响品牌战略的乐章

——新晃夜郎文化资源开发回眸 黄麒华(211)

夜郎文化与黔北崛起 田金海 郑继强 付尔光 李锦涛(221)

赫章——应该向世界展示夜郎风情 何 源(239)

科学分析长顺夜郎文化的深厚底蕴 沙先贵(247)

从彝文文献记载看夜郎源流 王富慧(257)

夜郎竹王多同考 王国栋(285)

云贵高原的古老民族——仡佬族 郑继强 田金海(297)

谈夜郎的统治民族 程发根(309)

从考古遗物看夜郎统治民族 刘 琳(319)

从青铜器遗物看夜郎社会 黄 娅(328)

棘人志略 任德清(338)

红岩天书揭示夜郎古王国始建于商朝 潘炯辉(355)

试论夜郎法制 刘 亚(365)

夜郎民族婚俗文化 王玉桂(377)

夜郎研究现状的理性思考 李发耀(384)

试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夜郎问题 张国洋(393)

仡佬族先民奇特的葬俗 蹇泓波 田金海(403)

附录:

在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长顺分院成立大会上

的讲话 刘胜康(408)

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长顺分院章程 (410)

后 记 (414)



夜郎青铜立虎与崇虎信仰试析

余宏模

2000年9月至10月,考古工作者在贵州省赫章县可乐镇发掘了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古墓。该墓群共计112座,属夜郎时期的古墓葬。这些墓葬具有多种独特的习俗特征,其中五座是最重要的套头葬,出土的大型铜器、兵器、饰物和陶器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在罗德成地工区发现的M274西汉墓,是这次发掘中墓主身份最高的墓葬,出土器物达100余件。M274中用大铜釜套头,死者脚部又套一件大铜釜,而且在面部盖上一件铜洗。右臂上盖二件铜洗,在左臂旁还侧立一件铜洗。套头的铜釜十分贵重,在铜釜肩、腹部至口沿处装饰一对圆雕立虎,形态为昂首扬尾,龇牙长啸,十分威武。在同墓坑内还有一只勇猛的青铜立虎,装饰在戈秘的顶端。还有一件立虎铜挂饰,出土时在死者颈部,与相邻近的玛瑙管、玉珠、骨珠似应同是颈饰物。在同一座墓中竟然出土四只青铜立虎,实属罕见。再加上铜釜套头脚、铜洗盖脸又盖臂,显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神秘气氛。

一

对该墓中四只青铜立虎的状况,经考古工作者的观察和实测如下:首先是套头铜釜侧立套于死者头部,釜外壁有烟炱痕。铜釜通高3.28cm,釜高28.4cm,口外径43.2~44.3cm,口内径34.8~35.4cm,口沿面宽4.15cm,口沿厚0.4cm,最大腹径49cm,耳径①9.35cm,耳片宽3.35cm;②9.25cm,耳片宽3.25cm。

套头铜釜为折沿,斜肩,面微下凹,鼓腹,肩腹处一道折棱,折棱不明显,折棱下有一周突弦纹,圜底。腹上部对称竖装一对环形辫索纹大



耳。耳片弧形，耳面尤显宽，每只耳辨索纹6组12道。肩腹部对称饰一对圆雕立虎，①通长17.5cm，通高10.5cm，臀宽5.3cm，身长12.45cm；②通长17cm，通高10.7cm，臀宽5.3cm，身长12.45cm。立虎颈部套一条项圈，项圈上刻贝纹，虎头后部刻一组卷云纹，虎身刻斑纹。立虎铆焊于釜上，釜内部有4处不规则圆饼形疤。铜釜外壁从口沿下至底有一道明显范缝，两只立虎亦各有一道纵向范缝，虎口内及体内保留有砂模，砂模经过修整虎形极协调。

另一只青铜立虎出土时位于铁戈内部上端，为戈秘顶端饰物，系用失蜡法铸造。铜秘冒略呈僧帽形，通高5.6cm，通宽5.6cm。冒体横剖面为尖叶形，冒顶前后角外展略向前翘，后角微长微高。冒顶面略呈两面坡形，冒中下部饰一周辨索纹。冒前端有一缺口，中部对穿两圆形穿孔，冒内残留少量木秘残片，穿孔内残留有固定用的竹钉。铜冒顶端铸一圆雕立虎，虎圆形，耳口微张，身体瘦削矫健，尾上扬反卷，前肢平曲趴地，后肢略曲下蹬，一副蓄势欲跃之势。虎身满饰长条斑纹，强劲有力。

另一件立虎挂饰，亦系失蜡法铸造。立虎站立于簧形圆管上，簧形圆管中空，内壁亦可看出簧条，簧条无间隙，管外紧附一贯通铜条。簧管通高1.8cm，管长1.95cm，管外径0.55~0.65cm，管内径0.3~0.35cm。立虎通长2.15cm，通高1.35cm，张口卷尾，前腿弯曲下趴，后腿弓状蹬地，作欲跃而起前扑之状，造型十分生动。此器出于死者颈部，与众多的骨珠、玛瑙管、铜铃等伴出。与该器相邻的还有一件铜质鼓形小挂饰，推测与虎形挂饰连缀为一组。

以上四只青铜立虎同出土于夜郎时期和夜郎故地的套头葬土坑墓同一墓穴之内，而在其他地方尚未发现，值得重视并加以研究。由于其葬式特殊，墓内还发现有卷云纹茎首铜柄铁剑等夜郎典型铜兵器，并与巴、蜀、滇等出土虎纹兵器、立虎造型相比较，故称其墓出土的四只立虎为“夜郎青铜立虎”，以利研究。

M274的墓主身份是当时发掘众多墓葬中最高的一位，出土器物达100多件。特别是其中出土一枚汉印，印面边长1.2cm，方形，桥形纽，印文为朱文篆书“敬事”二字（又译“敬吏”）。据《史记》记载，汉武帝



开发西南夷时，曾派使臣到夜郎地区“喻以威德，约为置吏”。夜郎旁小邑也遵从汉使之约。此汉印极可能是汉王朝官员赠送给当地首领的权信之物。由此推测墓主的身份可能是原夜郎侯王辖境的一位小“县长”的首领。从墓内陪葬的四只青铜立虎器物分析：首先是侧立头部套头的铜釜上的一对圆雕立虎，因为铜釜外壁有烟炱痕迹，说明此铜釜当为死者生前用作祭祀礼仪时的炊器，死后用作套头的葬器。其次是戈秘顶端装饰的一只勇猛的立虎，睥睨群山，由出土的铜兵器推测，墓主可能还是一位统领重兵的首领。最后是一只立虎铜挂饰，位于死者颈部，从器物看似是墓主生前挂于颈间的饰物，而且是作为灵物来悬挂于颈的。众所周知：虎是猛兽，有百兽之王的称号。而作为图腾或神物的虎，则当具有极大的巫术性威力，它具有御敌、逐怪、食鬼、避邪的功能。四只夜郎青铜立虎同出自一座套头葬墓中，充满着神秘的氛围，也反映出墓主人对虎的崇拜。

二

古代的巴蜀与夜郎邻境，巴蜀都是崇虎的部族国家。古史中记载的巴蜀虎文化，如《山海经·大荒经》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顓頊于此。”又史载：顓頊氏有一子，“居江水，是为虎。”指的正是以虎为图腾的远古巴人。古代巴族的虎崇拜习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唐人樊绰《蛮书》卷十亦说：“巴氏祭其祖，击鼓而歌，白虎之后也。”这都是说今湖北清江流域的古代巴族，他们以白虎为图腾作为信奉之神。

关于蜀族的虎崇拜，有的学者考证，蜀王开明的祖先是传说中的鯀^①。鯀在尧时被封在崇（今陕西）地为伯，所以又叫“崇伯鯀”。史书上有“庸侯虎”的记载，由于庸、崇是同国同族的异称，所以，“庸侯虎”也就是“崇侯虎”。在《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有一种神物叫开明兽，“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为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可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山海经图



赞》说：“开明天兽，廩兹乾精，虎身人面，表此桀形，瞪视昆山，威慑百灵。”开明兽兽身类虎，无疑是其氏族的崇拜对象。蜀国开明氏王朝是“荆夷鳖灵”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鳖灵即位，号曰开明（丛帝）”所建立的政权。从廩君射飞虫“天乃开明”，死化为“白虎”，“开明兽”即为“白虎”等历史传说来看，廩君和鳖灵可能出于共同的始祖，都是以虎作为图腾的。以上所述巴蜀以虎为图腾和崇虎习俗在古代史籍中是可觅踪迹的，而在考古材料中有关巴蜀虎图腾崇拜的资料，就更为丰富了。

首先是虎镗于的大量出土。镗于为乐器，历史上就有出土记载。如宋洪迈的《容斋续笔》卷十一就记载澧州和峡州长阳县曾出土虎镗于，其地属汉代南郡，与川东为近，是传说中廩君巴人的发源地，应为巴人的遗物。上世纪在四川、湖南、贵州、湖北等地都曾出土不少的虎纽镗于，这些虎纽镗于之虎皆为巴人的图腾。

其次是巴蜀文化中有虎形纹和虎图像的青铜器在四川全省和邻近省区都有不少发现，特别是川东蜀地出土的虎纹饰青铜器，时间之早，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远非其他纹饰所比。四川出土的有虎纹饰的青铜器中，除了在戈上铸有独立的虎纹外，在矛、剑、钺等器物上也铸有虎纹。这类虎纹青铜器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四川昭化县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就有发现，后来在犍为、荣经、绵竹、峨眉、郫县、新都、成都等地都大量出土有虎纹的巴蜀青铜器，特别以成都地区较为集中。从四川等地出土的虎纹青铜器来看，时间约早到西周末期，盛于春秋战国，晚至秦代。据统计，巴蜀青铜兵器上，虎纹有多种，多施于剑身基部，矛骹部、戈援本部，其中冬笋坝青铜剑上虎纹就占纹饰总数的37.5%，为八种纹饰之冠^②。虎纹一般为侧面，只刻一耳、一足，有的拖尾张口，尾尖呈狗状，有的虎身有虎斑纹^③。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已出土的巴蜀青铜器上较典型的虎纹和虎图像，主要有以下几种：1.“虎形纹”。这种纹饰在巴蜀铜戈、铜矛、铜剑、铜钺上都可见到。2.“虎头纹”。这种纹饰常见于巴蜀青铜戈上。3.“虎斑纹”。这种纹饰多见于巴蜀青铜剑上。

巴蜀青铜器上的虎图像，一种是单独成立的，不与其他任何图形符



号相结合；另一种是与其他图形符号相结合，不讲究对称和规律。单独成立的虎纹饰，往往占大部分铜戈的戈身和援部，或者是铜矛的骹部，其虎图像也力图表现它的狰狞、威武和勇猛，显示出其鲜明的个性。虎纹饰铸造或雕刻也十分精美，线条流畅，有些还采用浮雕的手法来刻画虎的特征。与虎纹饰相结合的图形符号，从已出土的实物资料看，较多的是手纹、花蒂纹，其次是鸟纹、蝉纹等。有的学者认为，手纹、花蒂纹是巴蜀青铜器上面一种十分特殊的纹饰，它频繁地出现在巴蜀青铜器上并与其他图形符号相组合，是一种吉祥的表示，一种胜利的象征^④。由此看出，虎图像与手纹、花蒂纹等图形符号相结合，是古蜀人与巴人将它作为图腾的对象，含有神化及族徽的性质。

从目前巴蜀之地的考古材料来看，蜀地出土的饰有虎图像的青铜器，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巴地。有的学者将巴和蜀地出土的虎形纹饰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蜀兵器上的虎纹，张嘴而露齿，背有剑齿，尾平后伸略上卷或下曳其尾。同时有些虎身周围有“竖心”，棱形及人，花蒂等。巴地兵器上的虎纹，身多无纹饰，有些形状似狗，尾多上翘，尾后饰有波浪纹，虎嘴张而不露齿^⑤。将巴蜀青铜器上的纹饰符号及墓葬随葬品进行比较后认为，蜀地较巴地精致复繁，证明蜀文化高于巴文化。

另外，还有一种虎形器物。如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虎形器^⑥，圆眼，尖圆形大耳，昂首，竖尾，张口露齿，身肥硕，作圆形，四足立于一圆圈座上。圈座径8cm，虎身长12cm，残高11cm。坑内出土的青铜尊，肩上饰三龙，肩下饰三虎，虎口衔人。坑内还出土金虎形饰，大头昂起，眼镂空，大耳，身细长，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扑击状，通身模压目形斑纹，长11.7cm。同时，广汉三星堆二号祭坑内，也出土了数件头上饰云形角，双眉内勾，圆眼大嘴，上下两排牙齿相咬的形似虎头的兽面具。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 K1:158 龙虎尊上的龙和虎都做成一首两身，分别盘于肩部。龙身犄角高立，双眼圆睁，昂首挺立，龙身作腾飞状。虎首两眼圆睁，虎须和两只大耳用云纹勾出，虎嘴咬住一个人头，被咬的人的双手、双足作蹬腿伸手挣扎状，给人一种威严恐怖感。上述考古资料正是古代巴蜀崇虎文物的遗留，是考古材料中的巴蜀虎文化。




除巴蜀外与夜郎紧邻的真国,也有崇虎的考古材料,最有代表性的当是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两件祭祀人物群雕贮贝器。一例为 M1:57 祭祀人物铜鼓形贮贝器^⑦。在直径 24.5cm 的器盖上塑铸五十一人,器盖表示一祭祀场地。近面正中,横向并排树立一碑一柱,碑为矩形厚板状,上端钝圆稍尖,前面脚下横置础石,一赤裸男子背缚立于础石之上,长发散编成束向上系于碑头,两条绳索分别于背后和膝下,通过碑体将他绑缚在碑面之上。碑右立柱,柱端塑立一虎,作举头扬尾之形。柱身缠塑两条蜿蜒的长蛇,头均向上,作攀延上升之状,柱础塑一身似蟒而头后有两爪又似鳄鱼的爬虫。柱后立一老妇,面柱作揖。

又一例为 M12:26 祭祀人物贮贝器^⑧。在一高亭建筑背后的场地上,也是横向排列一碑一柱,位置也很对称,也是左碑右柱。此碑比前器碑形规整,矩形厚板状,上端半圆,前面脚下横置础石,石上仍立一赤裸男子,发髻不解,但仍用绳索通过碑体系牢,背缚,腰际和足胫,各用一绳通过碑体系牢。碑右立柱,柱顶原塑物失落。但四足痕可辨,若以前器立柱推之,也当为一立虎。该柱塑有四蛇向上攀登,头均出露于柱端边缘。柱础塑一巨蟒,吞噬一男子,人臂、胸和头部露于蟒口之外,并以双手扶于巨蟒颈侧,此蟒蟠于柱础之上,身体后半身未塑出,似有隐于础下之意。

该两器群雕图像的主题,或称“杀人祭铜柱”;吾师冯汉骥教授另以“报祭”为前一器主题,而以“诅盟”为后一器之主题,同时,在其文章注释中保留了“也可能为‘祭社’”的很有见地的看法^⑨。立虎高高踞于铜柱柱端,是作为崇祀的神物,典型地反映出滇族亦有崇虎的信仰。

三

目前,在夜郎地区的考古材料中崇虎的文物并不多见。出土的青铜器中,以兵器数量最多,这反映出当时征战频繁的社会现象。铜兵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喇叭形空首一字格铜剑、卷云纹茎首青铜剑、卷云纹茎首铜柄铁剑、T形茎一字格曲刃铜剑、扁圆茎无格曲刃铜剑、直援无胡铜戈、饰  符号的铜钺、曲刃铜矛等。这些风格特殊的铜兵器,多



数不见于四邻青铜文化中,有的虽有相似性,但也具有自身的特色。如直援无胡铜戈,戈援上铸有心形纹(胡桃纹),戈内上铸有三个牵手上举的人形图案。类似的铜戈在云南滇文化中也有出土,但贵州出土的铜戈,内上的图案浮雕较浅,而滇文化铜戈图案浮雕较深。从贵州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的刻有相似图案的陶模,说明贵州这种铜戈系当地铸造,有自身工艺的特点^⑨。总之,在目前出土的青铜器上却很少具有巴蜀出土的虎纹和虎形器。贵州松桃县长兴乡大树村农民在一坑中曾发现四件大小不等的镞于;再就是赫章可东镇罗德成地套头葬 M274 墓发现的上述四只夜郎青铜立虎。松桃镞于显然应是古代巴人的遗物;赫章可乐青铜立虎则应是古代夜郎人的遗物。虽然有关套头葬式和青铜立虎的发现仅限于赫章可乐,此外并未发现;但他是在夜郎时期和夜郎故地出土的文物,四只青铜立虎又集中在首领人物充满神秘气氛的套头葬墓内,它是否是墓主崇虎信仰的表现?而崇虎信仰的墓主族属身份也可窥之端倪否?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巴蜀出土的青铜器上,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四川郫县、新都、万县等地出土了铸有方块象形文字的虎纹铜戈。他们的形制基本相同,只是纹饰稍有变化,如郫县出土的铜戈,戈身中后部的两面,各铸有一造型奇特,图案精细的虎纹,头向锋,张口瞪目,狰狞凶猛,耳突出,向后伸,虎身为阴纹。在虎纹旁有一头挽椎髻,跪在地上,腰间悬刀的人像^⑩。铜戈上的方块文字不属于汉字,也有别于甲骨文,可能是古蜀人自己独特的文字。但是,有学者研究认为上述铜戈上的铭文符号,与彝族文字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的戈上的铭文仿佛出自彝族工匠之手。四川出土的铜戈铭文与彝文为什么会有如此相似的联系呢?这启迪我们从民族学的角度来探讨夜郎青铜立虎的虎崇拜问题。

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彝、白、纳西、土家、拉祜、普米、傈僳、藏、哈尼、怒、阿昌、羌等都崇尚虎,以虎为图腾。其中彝、纳西、拉祜、傈僳、哈尼、怒、阿昌等族崇尚黑虎,奉黑虎为图腾;土家、白、普米、藏、羌等崇白虎,奉白虎为图腾。无论崇黑虎还是崇白虎,追溯其源,都是对远古羌戎虎文化的继承,其渊源都可追溯到虎伏羲氏族部落。伏羲,是被尊为中华民族“三皇五帝”之首,相传,“伏羲生于成纪”,这正是曾为古羌



戎长期活动中心的今西北甘南天水一带。古籍常将伏羲写成“虚戠”^⑧，二字均从“虎”；《郑氏诗谱·陈》等称伏羲为“太皞虚戠”，“太皞”是尊称，“皞”又作皋，义为虎，表明伏羲是远古羌戎的虎图腾名号。伏羲（虎）氏族，由于人口繁衍增殖，分化为以黑虎、白虎为标志的亚氏族。这样，在伏羲部落，有了黑虎、白虎两个亚氏族。经过漫长历史的演化、发展，逐渐形成了彝、纳西、傈僳等崇黑虎；土家、白、藏、羌等崇白虎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民族。彝族是古羌戎的遗裔，先秦时期可能就已逐渐分化出来称“夷”，但沿袭了古羌戎的虎图腾名号。《山海经·海外北经》称：“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注下引吴任臣云：明，朱谋诤《骈雅》曰：“青虎谓之罗罗”。《山海经》所说“罗罗”的位置，约当甘肃张掖以北一带，为古代羌戎活动地区之一。古羌戎被称为“罗罗”，今日彝族中尚有许多自称“罗罗”的支系，不但表明彝族与羌戎在古代有渊源关系，且其虎图腾亦是源于羌戎的传承。

四

彝族分布于滇、川、黔、桂四省区，是祖国西南人口最多，历史悠久，有彝文典籍传世的少数民族。彝族继承的古羌戎文化传统，包括对虎的图腾崇拜，应是原生的图腾崇拜。彝族还有多种多样的图腾遗迹，但他们都是由虎图腾分化出来的衍生图腾^⑨。

彝族的虎图腾，首先表现于其自称与对虎的称呼相同。彝族称虎为“罗”（有乐、洛、拉、腊、浪、勒、牢、老等方言或别译），今云南哀牢山脉上段巍山、南涧、弥渡、景东、南华、双柏、楚雄等县的彝族，以“罗罗”作为自己的族称。男人自称“罗罗颇”，女人自称“罗罗摩”。“罗罗”是“罗”的叠称，因而他们也称自己为“罗”或“罗颇”、“罗摩”。彝语“颇”义雄性，“摩”义雌性，“罗颇”、“罗摩”之意为公虎、母虎。即彝族以虎族自命，男人自称公虎，女人自称母虎。由于他们自命为虎，故其世代所居的山冈、水流、村寨乃至人名，也常被命名为虎。例如，纵贯滇西的哀牢山（《景东县志》作“艾乐山”）为自称“罗罗”的彝族世代居住之地，其“哀牢”（艾乐）二字，彝意为大虎（哀、艾，义大；牢、乐，义虎）；